



## 改革的内涵与转型的选择(4)

毛立言

2008-9-22 10:40:33

来源：《江苏行政学院学报》

打印本页

关闭窗口

## 改革的内涵与转型的选择(4)

——对改革内涵与方向歧变的政治经济学求解

### 参考文献：

- (1) (比) 热若尔·罗兰：《转型与经济学》，中译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
- (3) (美) 斯蒂格利茨：《社会主义向何处去——经济体制转型的理论与证据》，中译本，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 (4) Jeffrey Sachs 胡永泰 杨小凯，2003：《经济改革和宪政转轨》，《经济学》（季刊），第2卷第4期。
- (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
- (6) 参见张颖主编《中东欧走向市场经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
- (7)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
- (8)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

[1] 20世纪中叶以后肇始的社会主义改革运动，发展到要搞真正的商品—市场经济的时候，就发生了阶段性的重大变化，此前称之为“改革”，之后被称为“转型”或“转轨”。这时，国外使用和出现频率最多的词汇就是Transition，国内中文译为“转轨”，有时也译为“转型”。Transition一词自古有之，其原意是指从一种形态转变或变成另一种形态的进程，具体到社会进程，则意味着从一种社会经济和政治形态向某种其他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形态的转变。如何针对当前发生的新的社会现象对这个概念的给予新的界定，已经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讨论，已经对这一概念给予了各种界定。

[2] 1990年10月由维也纳比较经济研究所组织的题为“转型的经济与政治”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就对有关的重要问题进行了“基础性”的讨论，其中包括了有关转型经济的新进程、新概念和新任务。此后，学术界对转型经济这一概念给予了各种界定，提出了各种不同的观点。

[3] 1996年世界银行的发展报告《从计划到市场》，由于其中涵盖了全世界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国家，所以把转型的长期目标说成是“建立一种能使社会水平长期得到提高的繁荣的市场经济”，但指

出这是一种“深入到规范行为和指导管理的体制转型，既是社会转型，也是经济转型”。认为只有当“转型中的问题逐步退化为成熟的市场经济中的正常问题”时，这一转型进程才算完成。（参见世界银行：《1996年世界发展报告《从计划到市场》中文版，中国财政出版社1996年版。

1 按照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观点，市场不过是资源配置的工具及机制，而这一工具的核心又是价格调节供求的机制。因此，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核心就是“管住货币，放开价格”，是价格机制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调节作用。以此为中心，整个经济体制包括价格、工资、利率、汇率、外贸、金融、劳动工资、社会保障、**收入分配**、投资等各个方面都要实现从行政协调向市场协调的根本转变，这就是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全部含义。

[4] 新制度主义经济史学家道格拉斯·C·诺思在谈到在1990年作为四名美国人之一应邀到前苏联提供经济改革建议时说：“第一位美国人说，你们所要做的就是私有化，然后一切都会变好。第二位美国人说，你们所要做的就是淘汰政府，然后一切都会变好。第三位美国人说，你们所要做的就是拥有计算机，然后一切都会变好。我是第四位美国人，我说，别理会前三个人的话；问题是相当复杂的。”他以“私有化”为例来说明问题的复杂性，他说：“私有化正趋向于成为医治一个国家疾病的万能药。但不用说，任何密切观察苏联—或现在的俄罗斯—的人都能注意到，私有化没有法律规则和实施机制的基本结构相配合并不会产生预期结果。”

2 马克思是经济学发展史上最彻底、系统的制度主义和结构主义经济学家，形成了最注重制度、结构分析的经济体系。对于这一点，当代不少著名的思想家都对马克思的理论框架给以高度评价，就连新自由主义制度学派的重要人物诺斯也给予了客观的承认和高度的评价，他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框架之所以是目前对长期变革最有力的论述，恰好是因为它将新古典框架舍弃的全部因素都包括在内：制度、所有权、国家和意识形态。马克思所强调的所有权在有效率的经济组织中的重要作用以及现存所有权体系与新技术的生产潜力之间的紧张关系在发展的观点，堪称是一项重大的贡献。”（诺斯：《经济史上的结构和变革》，商务印书馆1991年中译本，第61—62页）当代美国社会学家J·亚历山大肯定和赞誉“马克思是关于社会结构的最伟大的理论家”，他认为：“马克思为后来的理性主义者建立关于社会结构的理论奠定了基调，甚至那些用抵消他的著作的革命的齐里亚主义者精神的办法来使其著作‘世俗化’的人也紧紧追随他的普遍逻辑。”（J·C·Alexander: Action and Environments,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1988, P. 18 . 19. ）

3 关于马克思社会经济形态结构图式的理论，是一个需要重新认识的问题，现在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认识分歧，就与这个问题有关。对于这个问题，笔者已在一些文章中做过一些论述，但还需要进行专门的详细的论述，笔者将专文详述这一问题。

3这里仅是从社会形态的“硬件”结构系统做出的解剖，社会习俗、社会意识和文化暂时被抽象和舍弃掉了。社会经济转型当然包括精神文化和社会意识层面的深刻转变，本文暂不论述。

[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57页。

4在一定生产力基础上，交换关系系统由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的转化，会引起社会基本结构的变化。现代型基本构架是现代化的基本结构要求，它是人的独立性为基点的人的利益追求和创造性发挥的前提。这一社会基本构架在现实中是共性与个性的统一，现代型社会具有共同的基本构架，但由于基本经济制度的不同，比如资本主义私有制和社会主义公有制，这种共同的社会基本构架又具有不同的性质和特征。

1 国内外的大量文献可以充分说明这一点。计划型社会主义体制建立和运行以后不久，关于社会主义与商品经济的关系问题就开始讨论，这种讨论分为几个阶段，已有汗牛充栋般的文献。

2东欧改革学派的一些理论家认为，虽然有经济学家曾设想，现代信息——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将使我们得以解决用预定计划配置资源在信息方面的困难，提出用计算机解联立方程的办法来解决信息方面的问题。但现代经济的发展表明，信息量的增长和信息传递和变化的快速，单靠计算机技术的提高来解决信息方面的问题也是不可能的，况且还有激励问题无法解决。因此，用以市场机制为基础的方式来取代以行政—计划手段为基础的方式，就是一种必然的选择。参见兰格：《计算机和市场》，载兰格：《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中文版，第183—186页。

3 西方主流经济学主要是研究市场经济的，其对市场经济的某些领域、层次、关系和运作的研究已经达到相当精细的程度，但在一些基本的理论层面存在缺陷，缺乏历史感和社会经济结构内涵。正如新制度主义经济史学家诺思指出的那样，新古典经济学涉及的是市场的运作而不是市场的发展，它既舍弃了时间因素，又假定制度不起作用，所以就不可能对制度的变迁和市场经济的形成与发展做出

正确的理解。

[6] 经济体制改革存在着由经济关系二重基本结构（横向交换关系和纵向生产关系）决定的二重基本内涵，即经济运行机制（以价格改革为核心）的改革以及所有制形式和结构的改革。这也就是一般所说的经济体制改革的两条主线。此观点毛立言在《社会主义转型经济的制定变迁背景》一文中提出并论述。此文载王振中主编《中国转型经济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中国物价出版社2002年11月版。

[7] 传统社会主义“转型（Transition）”并不是只有一种趋向和结果，除了抛弃社会主义转向资本主义以外，还有转向新型社会主义——市场社会主义的可能和现实。鉴于这种情况，笔者认为在译为中文时应该区分“转型”和“转轨”的使用。“转型”是指形态的转变，社会主义的计划形态转变为社会主义的市场形态，即可称为“转型”；“转轨”是指轨道、道路的转变，含有社会性质、道路转变的意思，因此，凡意指和实指向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转变的，应称为“转轨”。

1 自由市场经济制度的理论源自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自由主义。古典经济自由主义又源自启蒙运动的自然法思想。斯密认为，市场力量的自发作用形成一种和谐的制度，所有经济主体自私地追逐个人利益，会导致资源的合理配置，导致不仅对个人、而且对社会来说共同的财富和福利增长。后来的经济自由主义就更明确地论述了自由市场经济与私有制的天然统一。现代新经济自由主义则更进一步论证了私有产权与自由市场经济的本质联系。“华盛顿共识”及其在转型国家中的实践表现（“休克疗法”是“华盛顿共识”在俄国和东欧的实践表现）就是这种思潮的典型代表。其理论核心是：只有确立私有产权，才能使企业成为真正的市场经济主体，企业才会对市场信号做出有效反应；只有形成真正的市场价格，企业行为才会合理。

20世纪90年代以后，新自由主义思潮成为符合苏东国家社会强势阶层利益要求的主流意识形态。原来的改革派及其理论流派迅速发生分化，一些人转向新自由主义。科尔奈就是这种转变的有影响的代表。在1990年以后出版的《通向自由经济之路》等著作中，科尔奈认为市场社会主义完全是一种空想，明确提出了向自由市场制度过渡的主张。

3 社会民主主义转型模式的理论基础是社会民主主义思潮。苏东剧变不仅使社会民主主义受到右翼势力的攻击，同时也使它得到肯定和发展。西方国家的社会党人认为，苏东剧变不仅标志着资本主义战胜社会主义，也标志着社会民主主义对于科学社会主义的胜利。欧洲是社会民主主义的发源地，东欧在社会民主主义的传播和发展史上也有着特殊的地位。在东欧诸国中，二战后实现的社会民主党“共产党化”是迫于苏联强大压力下做出的选择。实际上，在这幕“合并喜剧”中埋下了1989年发生历史性逆转的“悲剧”的种子。虽然这种合并实现了工人运动的统一，建立了由共产党掌权的高度集权的政治经济体制，但社会民主主义的暗流从来没有静止过。参见张月明著：《民主社会主义在东欧》，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2 曾在社会主义改革运动中产生过重大影响的著名经济学家布鲁斯是这方面的一个代表。在1998年出版的《从马克思到市场》一书中，布鲁斯修正了自己的改革模式和理论，他一方面承认社会主义的价值观，但同时又对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兼容和结合表示怀疑，从而转向社会民主主义。

（Włodzimierz Brus and Kazimierz Laski, From Marx to the Market, P151-152, Oxford University 1989.）

1 俄罗斯在新自由主义指导下实施的浪漫主义“大爆炸”“休克疗法”，不仅没有取得预期的结果，反而造成了经济的急剧混乱和下降，社会阶层急剧分化，社会冲突加剧，宣告了新自由主义在俄罗斯的衰落和破产。早在90年代中期，也正是新自由主义指导下的经济转轨陷入困境之时，其经济转轨模式的演进出现了新的动向，俄罗斯持“第三条道路”主张的社会党团就开始活跃起来。在普京上台之前，“第三条道路”在俄罗斯并没有真正成为政府的行动纲领，只是一种对过去集权主义和叶利钦的激进主义都不满的社会思潮。直到普京执政，俄政府才公然宣布走“第三条道路”的主张。普京的“第三条道路”则是指既不回到过去的计划经济体制，也不再搞前几年照搬西方模式的激进经济改革，而是“摸索自己的改革道路和寻找自己的模式”，“将市场经济和民主原则与俄罗斯的现实有机地结合起来”。《千年之交的俄罗斯》可以算是俄罗斯的“第三条道路”的代表作。[俄]普京：《千年之交的俄罗斯》，载《独立报》1999年12月30日。

2 从1993年开始，东欧又出现了新的变化，即1989—1990年剧变中上台的右翼势力与由原执政党（共产党）转变过来的社会民主党在东欧政治舞台上形成了轮流执政的局面。历史地看，波、匈、捷克三国在改革中民主社会主义价值观念已经在不断展露，这一过程实际上也就是各国共产党逐渐“社会民主党化”的过程。东欧社会在未来一个时段内也仍将处于调整时期，可以肯定地说，民主社会主义的存在、发展和演变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东欧各国的走向。

3在社会主义遭受重大挫折的情况下，世界左翼理论界开始了新一轮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关系的探索。国外对市场社会主义的探索就表现在以罗默（John E. Romer）、巴德汉（Pranab K. Bardhan）、弗勒伯伊（Marc Fleurbaey）等为代表的第五代市场社会主义者的西方学者的理论探索中。他们对“计划社会主义”、“市场社会主义”和“市场资本主义”的深入分析的过程中，形成了与“二元机制论”不同的新的理论观点。当代西方市场社会主义提出的新观点中，首要的是，市场经济不是资本主义必然所有，市场经济可以与社会主义结合。私有制也并不是市场机制不可缺少的必要条件，在公有制的基础上也可产生商品经济和市场机制。这样就在突破传统市场社会主义“二元机制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市场机制中性论”以及赖以建立的“联姻论”和“市场机制主导论”，从而奠定了当代西方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的基础。

1 在对社会主义改革的看法上，国际上的一些左派人士，比如20世纪有相当影响的比利时著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曼德尔对于市场导向的改革持否定态度。他们坚持认为，市场经济必然导致资本主义。曼德尔认为，所谓“市场社会主义”既不能克服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的弊病，也不能解决自由社会主义的弊端，这种理论所主张的混合的社会主义只能是混合的神化（曼德尔，1992，1994）。

2 20世纪20年代，新奥地利学派的L. F. 米塞斯就旗帜鲜明地宣扬：“要把市场和它的价格形成的功能同生产资料私有制分离开是不可能的”，“市场是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核心，是资本主义的本质，只有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它才是可行的；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它是不可能被‘人为地’仿制的”。这种思潮，不仅反对计划型社会主义，而且试图从逻辑上堵塞社会主义与商品—市场经济兼容的可能性。

7 这里提出的所谓“剥离”，是指要在理论上承认要“剥离”的两者是相对独立的“东西”，现实中，复杂的社会系统中的各个子系统都是有机结合在一起的

[8] 在邓小平直接指导下召开的党十三大报告中，当谈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应该确立的具有长远意义的指导方针时说：“必须以公有制为主体，大力发展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生产社会化、现代化的必不可少的基本条件。”把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定位为“社会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是一个极其重要的理论概括。

[9] 邓小平从80年代后期就反复强调发展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建设的关系问题。他反复强调，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不是和经济制度的性质必然联系着的。他说：“不要以为，一说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一说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不是那么回事，两者都是手段，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67页）

1 马克思曾经进行过这种在思维中剥离的努力，即理清商品经济与经济制度各自特定的经济关系内核的理论建构，实现了生产关系与交换关系两者相对独立地位的确定及在系统结构中的关系定位。他不仅指出商品经济萌芽于原始共同体的尽头和自然经济的缝隙之中，而且明确指出了商品经济是几个社会形态共有的现象。这实际上已经意味着承认商品经济并不是和特定的所有制形式、特定的生产关系直接相关的东西，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接近完成这种剥离。特别是马克思构建了对社会经济形态进行政治经济学解剖的基本框架，已经把交换关系系统与生产关系系统分离为两个相对独立的系统，把这两个系统作为有着各自的特殊规律的整个社会经济结构体系中的两个坐标系。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关于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五形态”系列和“三形态”系列的学说，并对这两个系统各自的演进规律分别进行了研究。

来源：《江苏行政学院学报》

转载请经授权并请刊出本网站名

Copyright © 2005 www.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所有：马克思主义研究网 | 网站声明 | 联系我们

（浏览本网主页，建议将电脑显示屏的分辨率调为1024\*768）